

FREE WRITING

随笔是随的精神加笔的风格

随是内面的自由，精神的自由，随心所欲也逾矩

笔是一种小型的、边缘的、反规范化的文体

人文，以立人为本。人是万物的尺度，也是精神的尺度

无精神，非随笔；不自由，非随笔

林贤治 筱敏 主编

人文随笔

2006 春之卷

花城出版社

林贤治 筱敏 主编

人文随笔

2006 春之卷

FREE WRITING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文随笔 .2006. 春之卷

林贤治, 筱敏主编.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6.3

ISBN 7-5360-4714-2

I. 人 ...

II. ①林 ... ②筱 ...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5109 号

责任编辑: 张 懿

技术编辑: 薛伟民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787×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0 2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714-2/I·3733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话题

口述历史：1966年的红卫兵 [采访] 夏 榆 纪冰冰

2 / 令人悲伤的虔诚 徐友渔

8 / 让我们恐惧的陌生和敌意 艾未未

14 / 最理想主义的人生悲剧 邓 贤

天下

19 / 回头谈二战 流沙河

28 / 战争留痕 韩瑞亭

32 / 听吴德讲“十年风雨” 黄一龙

34 / 从法律角度看毛泽东稿酬 邵燕祥

38 / 革命良心 林子明

46 / 我们对于人类生命的态度 摩 罗

人间

50 / 1938年，一个人的山河 刘凯娟

55 / 在黑暗中升起黎明（外一篇） 夏 榆

73 / 出门 柳宗宣

80 / 理发店之歌 杜 辉

面影

88 / 囚笼中的高尔基 余 杰

92 / 哈维尔 刘向东

古意

96 / 奈何朝杀而暮犯？ 申全贵

99 / 神经过敏的“经济特科”考试 张 鸣

四季

104 / 是什么使我不由自主地仰望星辰 傅 菲

身体

106 / 大脚趾 [法] 乔治·巴塔耶 古磊译

书林

110 / “皮书”漫话 沈展云

120 / 读书四记 赵健雄

128 / 绽放在伤痛记忆之上 周佩红

131 / 自由才是祖国 寇 挥

纪念

132 / 人民·政党·民主 费孝通

西风

137 / 奥威尔在布尔什维克国家的遭遇以及一封鲜为人知的奥威尔致苏联的信

[俄] 布卢姆·阿伦·维克托洛维奇 闻鹰 译

143 / 在英国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说 [英] 哈罗德·品特 萧萍 建军 译

声音

147 / 我知道我在波兰不存在…… [波兰] Z. 赫伯特 唐晓渡 译



口述历史： 1966 年的红卫兵

采访 夏榆 纪冰冰

令人悲伤的虔诚

徐友渔(学者)

徐友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哲学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介绍和阐释西方理论。他以极大的热忱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文革中难以忘怀的事情太多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是1947年出生的，文化革命开始我读高三正准备填表考大学。我们一般把文革发动理解为1966年5月16日，那天是发表了一份很著名的“中共中央5.16”通知，在通知里面，毛泽东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那些人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他们，但实际上文革是从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而更早在1962年时候阶级斗争就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们思想上的弦已经绷得非常之紧了。因此文革是渐进的漫长的不断加温加压的过程，到了真正爆发的时候也并不非常突然。

当时对于文革的理解还是从正面出发的，文化革命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事情，我们也认为学校的教学还是不大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吧，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应该改造自己的思想，对于学校来说，课本应该改得更加革命化，培养学生应该朝革命化的方向努力，但是文革爆发后还是有非常令人吃惊的东西，比如文革充满了最多的东西就是武斗，文化革命变成武化革命，这就让我们感到吃惊了。如果说文革是5月爆发的话，到了6月全国就基本停课了，北京四中和另外一所中学提出今年高考就不要了，革命本来是在正常秩序下的革命，这样一来就更感觉是出乎意料了，但是我个人却是以一种非常激动的心情来迎接这件事情，现在来说这一定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但当时还是以非常狂热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件事情。这是文革第一件让我难忘和吃惊的事情，就是高考不要了。

红卫兵其实是以军队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组成的一支队伍，所谓红卫兵就是保卫红司令毛主席，这种意义上就是要打倒毛主席想打倒的任何人。红卫兵最大特点就是红五类，必须出身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家庭，还有出身于工人和贫下中农，其实是带有极端封建皇族思想的血统论，那些出身不好，非红五类家庭是不可能当上红卫兵的，而且是红卫兵打击和迫害的人。后来又有一批非常狂热的青年学生被称为造反派的，决不愿意称自己是红卫兵，因为红卫兵代表血统论和皇族论，红卫兵被理解为可以随便抄随便查的那些人，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海外的人，后来的人，把所有积极参加文革的年轻人笼统称为红卫兵运动。所以，前一种血统论的红卫兵我没有参加也没有资格参加，但后一种所谓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就是当然参加了，而且是很活跃的。那时的口号我们是百分之百完全信奉的，比如“为了毛主席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这是当时的一种气氛，也还有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另一种气氛，就是大革命的恐怖气氛，学生中有至少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怀着对中国历来政治运动的恐惧心理，特别是出身不好的人，当时有一句口号就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如果你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你来参加就会被问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想浑水摸鱼，想趁革命搞打击报复？当时的政治情况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要保护某个干部，你跟着他你就是左派，当要打击他时，那他就是叛徒坏蛋，你跟着他就是右派，所以在文革时候的组织经历是心酸的，一会说你是革命小将可以把你捧上天，一会又一下把你打成反革命分子，甚至派军队来镇压你把你投进监牢。我所在的组织就是这样，开始被肯定为革命组织，但后来又惹得中央不高兴了，说你刮起了“反革命的右倾翻案风”。

大串联是从6、7月开始的，8、9月达到高潮，开始我没有资格去，这是红五类才有的特权，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就只有整天在学校劳动。学生按家庭出身是分三六九等的，我不算最低等的，还有更低的，整天打扫厕所，红五类对他们要打就打，要吐痰就吐痰，有的女同学就被叫趴在地上当马骑。当时有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是老子是革命军人儿子就是好汉，老子是资本家什么的儿子就混蛋，而且得当着同学的面承认说自己就是混蛋，出身好的人叫出身不好的人“狗崽子”。常常是一大群学生到另一个学生家去抄家，说你家里有枪支弹药，有国民党的委任状，当然这是没有的，于是就把你家里值钱的东西给抄走。我们学校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据说她的父亲是资本家，全家就哆嗦在那里被抄，任由辱骂和殴打，她的母亲跟红卫兵顶嘴，红卫兵马上召开声势浩大的斗争会，当着众人的面，当着这名女同学和她父亲的面，活活乱棍打死了她的妈妈，丈夫女儿儿子就眼看着她被打死而一动不敢动，这种局面是很难想象的。当时1966年的8月是叫做“红色恐怖的八月”，“革命的红八月”。这个女同学的名字我还记得，那个主持批斗会的男同学我也知道，现在还是一名教师。

我们整天在学校里念毛主席语录，改造自己的思想，差的就整天打扫厕所，串连只

是那种红五类能参加的有特权的事情。但是后来，毛泽东把这种红五类的红卫兵给否定了，他们的斗争目标并不合毛主席的意，所以就把所有的学生都解放了，我们当时对毛主席简直感激得不得了，因此到了后来，最后，我也可以到北京见毛主席去了。有好多出身不好的人还是很惧怕，他们不能想象自己也有了这种权利，他们不明白毛主席又把他们解放了。我有一个同学在另一个学校，出身比我不好得多，他父亲是国民党将军，但他的思想非常解放和大胆，他来鼓动和怂恿我，因此我就到学校去开证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去了北京。很有趣的是，尽管当时大的政治形势已经改变了，但那个学校管印章的人仍然很不服气地认为，你们这些人也配到北京见毛主席吗，所以我那个同学的介绍信上，除了写明某同学到北京串连，同时还在后面括了一句，出身于反动家庭，所以我们去串连的时候，到什么地方一有事情他就让我去，因为他的介绍信拿出来就是那句出身于反动家庭。

毛主席一共接见了八批红卫兵，我大概是第七次吧，在1966年11月底12月初。我们原来想，中国那么大，能出趟四川就了不起了，结果这么一下就跑到北京去了，当时非常兴奋，尤其有相当一些过去都被称为“狗崽子”，都是被骂过去打过来的人，当然也有许多出身好的人，我的那个同学在这当中就总是像做贼心虚似的。火车上的广播都是，“一列列满载着革命红卫兵的列车奔向革命的心脏首都北京”，他就想，都是红卫兵，我是不是混进来的，其实没有人知道，但当时他就有这种心理。火车越接近北京，那种语气就变了，“你们是毛主席请到北京的客人”，听了后简直激动不已受宠若惊。到了北京就会安排住下，然后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回来后就真是为了毛主席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所以文革死了那么多人，而且是那么义无反顾的。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事情我们都从电影上看到过，都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热泪盈眶的，有的接见完了马上就到首都电报大楼，拍电报给学校，说“某年某月某日，我见到了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那简直是最激动人心刻骨铭心的事情。我们从头天晚上就开始等着了，一次是要有200万人通过检阅的，大街小巷都堵满了，所以我们几乎等了一晚上。有保安措施，检阅前要互相搜身，军队的人组织得非常严密，但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此外他们还告诉我们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要在离天安门很远的地方就要把视线聚焦到天安门上，等于提前你有个心理准备才能见到毛主席，否则经过的时候还没有准备就过去了，这将是多么大的遗憾。那些军队的人就告诉我们这些，还有一些细节，比如你要用绳子把鞋捆得非常牢固，因为极容易踩掉。我当时就记住了，始终盯着天安门上个子最高的人，因为毛的身材很高，但是从下面经过的时候，我发现怎么不对劲呢，因为我盯着的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跑来跑去的，于是我意识到我盯的肯定不是他，是个新闻记者什么的，我当时想这下糟了，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这一辈子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他了，我根本没有看到哪个是毛主席，等于这条宝贵经验误导了我。

另外那天的实际情况也让我感觉非常不好。我们想象当时的情况都是满脸泪水高声呼喊毛主席万岁的，就像在记录片里看到的，应该是非常神圣激动的，几乎是像麦加朝圣一样，但实际上，那天人太多了，没有接见 200 万人，只接见 100 多万人，剩下的人还可能在北平住上几天，再等着接见。就在当天接见的这些人中，至少有三四十万人的鞋子都被踩掉了，之前解放军告诉我们接见的情况是，每次接见都会踩死若干人，踩伤挤伤的人也上千，安全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另外踩掉的鞋子要拉上几卡车，这是难以想象的。我们那天检阅果然是这样，踩掉的鞋大约有几十万双，但是令我感到奇怪的甚至难以理解的是，我当时心情那么虔诚，而那些学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然在如此庄严伟大和动感情的一刻，把鞋子捡起来往天上扔，一时间遮天蔽日就像下了鞋雨一样，就像黑压压的乌鸦飞过一样。我那天感觉很失望，一个是没有盯住看到毛主席，再者我看到他们抛掷鞋雨我感到很受侮辱，因为我非常虔诚，我平时看到的记录电影接见的形势都是多么美好，怎么会是那样子呢，我感到很纳闷和愤怒。尽管如此，结束后我依然非常激动，毕竟是受到毛主席的检阅了，所以回去本地后就要坚决闹革命，绝对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的人回到接待站就把指头咬破，在纸上写，“今天见到毛主席，这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天，从此以后就要把整个生命献给毛主席。”

我把红卫兵运动叫做青年法西斯运动。为何红卫兵能够堂而皇之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他们是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以前说要打倒是要当成反革命抓起来的，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青年义和团打倒皇帝身边的宰相大臣一样，在整体上我是根本否定、彻底否定红卫兵运动的。更实际地说，红卫兵运动对于我们这批人的切身影响是，后来都被轰到农村下乡去，很多人一辈子的青春岁月就蹉跎了，这一代人除了极少数，百分百都是下过乡的。我算比较好的，下了三年，北京有很多下了七八年，等到调回的时候发现形势完全变化了，什么都耽误了。这一代人最悲惨的经历就是，大学停办中学停办，全部下乡，最后回来后有的去当工人，有的借口生病回来，在街道安排一个临时的工作，拉蜂窝煤，修自行车。纵然这些人中也有非常优秀的学者专家，有的当了领导的，他们可以说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拥有了辉煌的人生，他们称自己的一代为苦难与风流，仿佛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听到这些发言，就会感到他们是经历苦难而辉煌的一代，而更多人的生命都宛如在风头浪尖般被抛来抛去，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另一方面，这一代人经过了巨大的谎言和识破谎言的过程，他们中就有一些拥有着非常强的精神独立性。

文化革命其实是武化革命，从 1967 年开始充满了武斗，大家都以为在保护领袖，以为自己才是革命路线，结果群众中间发生派别斗争，当时很多兵工厂的武器都用来群众间打仗了，甚至有的很先进的武器，应该是解放军装备的，都用来群众间武斗，我们那时候说，除了飞机和原子弹没有用上，所有都用上了，四川最厉害的武斗，坦克冲锋枪

什么的都用上了。1967年5月6日，成都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武斗事件，数十万人各种组织的群众，去围攻一个成都的军工厂132厂，这是一个所谓被保守派占据的一个据点，而进攻的都是徒手的群众和学生，而军工厂的护厂队员都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向围攻者开枪，我目睹了这样的场面，真是一枪一个，我们学校的一个初三的女同学就被打死了，我们抬回她的尸体开追悼会，几天前的音容笑貌还在脑海里，就这样被打死了，这是让我感到沉痛和很受刺激的一件事。

我相信自己做过，并且在任何场合我都是不讳言可以忏悔的。对我个人来说，主要就是揭发批判自己的老师。文革中，学校的党政大权都是落在来自外面的工作组手里，他们来指挥运动，导演对于校长和老师的围攻，这几乎发生在当时每个学生身上，但就我个人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当时都是学习姚文元，给老师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复辟啊，反党反社会主义啊，当时有一位老师非常有文采，在报纸上写文章描写台湾海峡，说风平浪静这样的字眼，有人写大字报就说这是宣扬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台湾海峡那边是蒋介石集团，是风口浪尖，怎么能风平浪静呢，总体倾向就是如此荒唐。学生对辛苦培养自己的老师，无中生有地扣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把平常老师关心自己的话当成别有用心。

我当时的学校在四川是所老学校，前身是四川第一女中，校长是一位老地下党，她向苏联学习提倡母爱教育理论，老师要像母亲一样关心温暖自己的学生，这在今天看也是多么好而且人道的一个理论，而当时的罪名是用资产阶级的人道理论来腐蚀青年小将的革命心灵，女校长是非常谦和的一个人，身体力行母爱教育的一个人，我目睹她被打的惨状，内心受到很大震动，打人的头儿是高三一个学习武术的学生，一大群身强力壮的男学生一起打，被打前还戴上纸糊的高帽子，等于几乎是蒙面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方向会打过来，被打得惨不忍睹，一脚就从台上踢到台下，简直不能称为一个人，就像一个物体，我现在很难形容，整个脸打得已经看不出是一个人。当时像我这样的三等公民，是没有资格参与红五类那样打人的，即便是红五类，那种事情也是难于想象和做不出来的，那是完全没有良心的事情。

后来我下乡，总共三年，我下乡的地方还算好的，每天挣到的工分要是换算成钱的话，大约是五毛钱，一个女同学大概能挣到将近三毛钱，这样一年下来的摧残性的劳动，我一年大概能分到三百多斤谷子，相当于二百多斤大米吧，另外还有六七百斤的红薯，这在当地就算中上等的条件了。最差的女同学一天只能挣到五分钱，在城里就够买一支冰棍。我1972年1月回到城里，进工厂当了锻工，这已经是非常运气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大学。

文革对我们有刻骨铭心之痛，像姜文电影里所展示的那种文革时期的生活，我也相信是真实的，真实反映了他们的感情和体验，对他们来说是自由的、阳光灿烂的、无忧

无虑的，那种红墙大院里的父母未受冲击的生活也存在，和那些红五类的子女一样，他们或许觉得文革是好玩的，但绝对是少之又少的一些人，更多的人经历了文革的惨痛和摧残，如果把历史中最肮脏血腥的东西给片面美化了，我认为是对中国的苦难的一种侮辱。

文革中我是个非常虔诚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就想用百倍千倍的热情来付出，来获得组织的承认，获得自己政治身份和思想正统上的一个地位，所以我就认真地学习那些理论，改造自己的革命思想，而当有人质疑文革的时候，我算觉悟得比较晚的，我仍然相信所谓的革命真理，老是认为他们看到的是现象，本质是好的，看到的是局部，整体是好的，用当时所谓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理论来欺骗自己吧，而最终林彪事件的出现使得一代人开始看清并醒悟过来，我比这还是要早一点，但总的来说醒悟的较晚，但也因为如此，当我反思和觉悟的时候，我相信我比别人认识和醒悟得更加彻底。一言以蔽之，我将原来那种追求虔诚和正统的思想彻底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独立思考，不轻信那种宣传的权威，这一点或许也比一般意义上更加坚决。

文革是一个灾难，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文革是天大的坏事，但也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条件，如果不是文革把这种体制的弊端发展到极致，或许也没有今天改革开放的良好局面。当然，坏事碰巧变成好事，但代价和牺牲太惨重了，我决不认为那天大的坏事就成了好事。我们没有在理论上思想上对文革进行深刻清理和批判，这一点仍然是令人遗憾的。

让我们恐惧的陌生和敌意

艾未未(艺术家)

艾未未，诗人艾青之子、前卫艺术家、《北京人在纽约》副导演。从上世纪70年代作为“星星画派”的一员，到90年代艺术杂志《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的主编，如今的艾未未在建筑、雕塑、绘画、家具、编书等各个领域内自由穿梭。他是多项工程和景观的设计人，生活在由自己设计的登上了多家国际知名建筑杂志的“艾未未仓库”中。

1

我是1957年出生的，我父亲在57年被打成右派，去了东北，后来又去了新疆，我在北京出生后就和他去了东北和新疆，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大概8、9岁，我在新疆生活了18年，直到中学毕业后回北京。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在新疆石河子农八师——农业第八师，是个部队编制。新疆分两块儿，一块儿是新疆本地的少数民族，另一块儿也是更大的解放后为了屯垦戍边和稳定边疆，一部分转业人员就在新疆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部队编制农垦机制。我们在农八师是属于半改造性质的。我们全家都在那儿。刚去的时候生活并不怎样艰苦，当时农八师的一位军人和我父亲是朋友，所有到我父亲这个级别的右派都要去不同的农场改造，这个人其实对我们是有点保护意味的，就这样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我的记忆基本是从那时开始的。

很长时间里，新疆是比较稳定的状态，基本是政治斗争，没有大规模武装暴力，但是1967年的1月26日就在石河子农八师院里发生了所谓的派系斗争，双方交火打得乱七八糟，死了不少人，后来新疆的文革武斗和打打杀杀也很多了。每个单位都成立两个以上的组织，不管什么单位，一边造反派，一边保皇派，支持刘少奇或者原领导人系统

的就是保皇派，造反派就是要造他们的反，上上下下打得不亦乐乎。新疆有它的特殊情况，多数人来自内地，有的是怀着理想建设新疆的人，还有大量原属国民党部队的起义的人，这些人就地安置，还有知识青年，有的是自愿支边的，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大量上海知识青年都是资本家的孩子，我记得当时有几个上海人都是上海很大的资本家的孩子，有一个好像是派克笔老板的孩子，另外有一些是盲流人员，就是自然灾害后来自甘肃河南四川山西的，逃荒到新疆，背井离乡住下来了，再有就是劳改农场的犯人释放后就地安置，还有特殊理由去的，比如山东来了一批姑娘，因为部队没有姑娘。这是真正的西部开发，有点像美国加利福尼亚，到新大陆后，什么人都有，聪明的冒险的和犯罪的，文革后就爆发出非常激烈的派系斗争，新疆是特别杂的一个地方，有可能出现很复杂的情况，所以人们都是很怀疑地看别人。

文革刚开始主要是各种口号，每天都有人等待着新的口号，大家都很兴奋，有时半夜——可能夜里两点或四点，就听见敲锣打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到了，什么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什么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等，我们会跟着敲锣打鼓的这些车招摇过市，喊着这些口号，群情激昂。满天撒着传单，有时连夜印传单，高年级的学生刻蜡版，谁的字好就刻蜡版，纸很差很薄，但上面都是丰富的语言，因为纸一印出来就成传单了，绿的黄的，连夜叠好到外面去撒，人群当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很好玩，所有人就抢，觉得很热闹，秩序一下就打乱了。小孩最喜欢这个了，也不上学了，每天都是这样的事，但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我记得有一天早晨，突然看到整条街贴满了大字报，柜子那么大毛笔写的，一下有一两百张大字报，我一看，有一半是关于我父亲的，言辞都是很凶猛的话，什么大右派艾青的反党罪行啊，最新动向啊，我母亲穿高跟鞋的事情啊，很多人写的，很多人在底下签名，我当时看完就感觉怎么突然一夜间就成这样了，我就跑回去告诉我们家人，感觉好像晴天突然一片乌云就漫过来了，当时有那么多人，为何我父亲就一下被揪出来了，他又不是一个当权派。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开始往往是毛主席的两句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什么的，“扫除一切害人虫”什么的，战斗队都叫全无敌啊，扫除害人虫战斗队啊，社会上有力量的人都参加这种活动，每个人都戴着袖章，形式感很强。这一切就跟海啸过来了一样，没有人能够抵挡住，那是不可能的，要么是逃走，要么是被吞掉，逃是没有地方可逃的，空气里的每一滴水每一颗沙子都是革命的。

2

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正是我现在这个年龄左右，正是人生比较成熟的年代，他是诗人，右派等于是宣布了他政治生命的死亡，罪名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个罪名

是很大的，你没什么不反了，今天任何罪名都不能和那个时代很小的罪名相提并论。叫你一声坏分子你就完了，而原因很可能是你跟某个女孩开了个玩笑，偷看了一本什么书，或者偷听了一次敌台，都是很小的事情，就可能是反革命，拖出去拉到田野里一枪就可以打死。那个年代所有人都经历了耻辱，而使今天的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无论是我们父辈，还是年轻人，精神上都受到创伤，行为规则上思考方式上都受到影响。

我那时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少年，能记住的都是儿童的事情，什么挖个陷阱等人家掉下去啊，见着汽车躲树后面扔两个石头啊，但是我们家突然就成了大字报对象，很多人在那儿认真地看，宣传力是很大的，第二天所有人看你不一样了，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你原来是这样的啊，原来是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啊。我父亲和母亲也去看了，他们回来就特别不高兴，写大字报的人都是到我们家来得最多的，曾经是管他叫艾老师的，很谦卑的喜欢文学和写诗的一些人，关系很好的一些人，要不别人也不了解你，或者我母亲曾经把一件她穿不了的旗袍送给人，而那个人就会写大字报，说我们试图腐蚀他们，甚至我们说过每一句话都能写出来，非常恐怖，仿佛你一下成为了舞台的中心，所有的灯光打着你。

我们邻居家，就是和我哥哥姐姐一起玩的一些孩子，都是很要好的一些孩子，他们忽然变成了左派，出身好的造反派，他们或者听说了我们家的什么事情，某一天就会突然一脚把门踢开，说谁谁出来，说我们要抄家，就可以翻东西，把书架上每本书打开，一页页翻开，抽屉里的信件照片，只要是和私人有关的他们就可以拿走，谁也不能说一句话，说一句话他们就会打你惩罚你，而这些红卫兵都是邻居家的孩子，家长都是很好的朋友，感觉社会变得没有任何安全感可信感，全乱了，东西能拿走的拿走，该撕的全撕烂。最早抄的就是我们家，后来就都被抄，我的一个印象就是一个战斗队来抄，然后又一个战斗队来抄，什么又都被翻，东西又被拿走一部分。当时日记等是造成许多人死亡的原因，比如开会，有的人觉得社会有问题但不敢说，于是写进日记里，日后就会成为把柄，一生都交代不完这些问题，不断有人找你谈话，让你交代这些问题。多数人就连夜毁掉这些东西，任何证据，毁掉亲戚的信件，尽可能说自己没有亲戚，毁掉和自己内心有关的东西，毁掉照片，和别人的照片，因为你不知道哪个人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是人类最黑暗的历史，比纳粹历史要黑暗，那是异族人之间，而这是亲人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

父亲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进过国民党监狱，逃亡，到延安，进京，没有家的感觉，民族的灾难，社会大的背景，政治运动总会涉及到他，我的生活受到深刻影响，但是亲情的坏的影响没有，我经历的事情是有影响的，就像一棵树受到风和土地的影响。我那时开始觉得大人说话有秘密了，他们说话不太希望小孩子听到，他们有时说谁谁又被抓走了，谁谁被斗争开万人大会，都是一些很紧张的事情。当时我很羡慕地看到家庭

好的上北京串连了，去延安了、韶山毛主席故居了，他们穿着很好的军装，系着很好的皮带，那个东西成了当时的时尚，谁要是有一身正规的军装那就太漂亮了，女孩子会喜欢上那些革命家庭的孩子，你要是有一枚从北京寄来的毛主席像章，或者这枚像章是到北京串连时戴过的，那比今天一枚戒指值钱多了。革命身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贵族感的事情，虽然涵义相反，但它是最傲慢最有权利感的事情，你可以摧毁颠覆所有的价值，同时你的力量就出现了，而当时青年人就被赋予了这样的权利。当时任何会写毛笔字的人都成了热门的人——就像 SARS 时候卖口罩的人，满天都是大字报，昼夜的写，充满了热情，我一方面很快乐，不用上学了，同时我也没有什么更多感觉，因为是儿童，感觉是全部接受，没有感到羞辱，但会感觉陌生和敌意，发现社会把我排斥在了外面。那时我们把我们家所有的书烧掉，文学的历史的宗教的，从文艺复兴到印象派的，有的纸非常硬，点都点不着，我和邻居小孩还把书拢成一堆大火，看着它烧。有一天晚上我们和邻居孩子捉迷藏玩，我翻到一个屋子里趴到地上想躲的时候，看到眼前是一堆信和照片，我一看都是我们家的信和照片，像小山一样的都是红卫兵搜去的摞在那里，我回去对母亲说那儿都是我们家的照片什么的，他们就回去找，找回来一些，但是有些没有找回来，比如毛泽东给父亲的信等。

3

我们早晨起来要先请示，上学就是学毛主席语录，所以整段整段我都会背诵，检查自己的行为说哪件事做错了，很小的孩子都会说我今天把脏纸扔到地上了，在全体同学面前检讨，吃午饭递上去碗的时候要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他听完了也背一段才把饭放到你碗里，跳舞是跳忠字舞，唱歌唱的都是我们多么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是恩人等，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人不这样，我也是的，只不过这样做的时候是很不自信的，因为是人民的敌人啊。晚上放学回家，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灯，就是一盏很小的油灯，没有书籍，我记得很晚的时候我读了《共产党宣言》，都是从中央党校寄过来的，我十岁就开始看了，但我不太懂都是什么意思。我父亲只有一本书没有烧掉，是本《法国大词典》，是法文的，他就每天逐条摘录出来，比如跟罗马有关的，人物啊事件啊，他就摘出来，没有纸，就写在过期的发票上面，结果他的眼睛就失明了一只，没有光线太暗了，也没有营养，我们一年吃不到一顿肉，过年算改善的就是玉米面里面放上糖精和颜色，红色的窝窝头，我们就会很高兴是红色的窝窝头。我们今天可能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但当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切，就像太阳为什么会升起一样的自然。

所以我说，那个时候物质生活算好的——因为没有任何物质欲望，而这是最好的物质生活，也吃不饱，穿不暖，我们当时是住在地下挖个坑，钻进去的，像地窖一样，上

面蓬点草，冬暖夏凉，但是很小，没有窗户，很暗，顶上挖了个洞当窗户，整个连队中只有我们家这样。他们认为他是中国最大的右派，怎么能表示你是最革命的呢，就是对反革命的惩罚，那么这种意志怎么表达出来呢，只有你对“敌人”下手狠的时候，就像黑社会的做法，你要参加那么你把这个人打死吧，你不敢打你怎么能参加呢，而当时每个人都是这样主动来证明自己的。你会很恐怖地听到，谁谁又被打死了，没被打死就很幸运了。那个时候人没有任何期盼，我对北京没有任何印象，也没有想到能够回到北京，说实话我们从来没有期望能够离开那个农场，政治形势一天比一天黑，那天就越来越黑，你还会认为它能亮起来吗，太阳还能升起，那就太奇怪了。你成了全国的敌人的时候，改变的是你还是全国呢？你的境遇也好死亡也好，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包括今天我都认为，任何人和他人都很难有非常真实的关系。

十六七岁，我对社会所有价值反叛，完全不相信任何事情，我们从小经历的信仰都是冠冕堂皇的。我父亲已经在农场打扫厕所好几年了，身体非常差，一天晚上，一个人，农场上另一个被管制的人，他平时不跟任何人说话，那天突然到我家来，拿出一份文件，中央文件，就是讲林彪叛逃的事情，当时那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央文件丢了，他平时和我父亲也不说话，他认为我父亲是当时最应该知道这个事情的人，当时我们家又处在一个很恐怖的境地，等于是参与了偷盗中央文件的活动，这个罪太大了。

我们的家庭关系就是这样的，与父母的交流都是很少，所以我们从小都很独立。我们既没有因他们当年文革中遭遇感到耻辱，社会给予他们的荣誉和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

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情感也是空白的，因为那个时代是不稳定的，或许跟我的安全感有关系，别人愿意跟你亲密的接触或者很真实地对待你，这也没有。眼光都是回避的，我觉得这也是很有问题的。任何一种经历都是经历，由时间和境遇构成的，只要我们没有形成偏颇，造成我们的判断形成损伤，要是那样就是牺牲品了，但我无法判断自己，可能我是最扭曲的一个。当整个社会你不能相信的时候，你必须建立自己的体系，虽然不一定是有意意识的，那你就回到你自己最好。

4

小时候觉得很奇怪。原来新疆是个很平静的地方，但是秩序可以在一夜之内完全消失，每个人都会怀疑、猜测、恐惧，不知道下一件事情是什么样子，这都是在一夜之间可以发生的。今天也完全可能是这个样子，曾经促使这些发生的人、民族的文化还有它的一些性质，都仍然存在。今天如果打开一张文革的照片，经历过的人也不会相信，怎么当时会是这样的吗？或许有的人没有把它理解为伤痛，因为对伤痛的理解是不一样